

邓贤文集

中国知青

谨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献给所有留在昨天和走进今天的同龄人。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邓 贤 文



中国知青梦



邓 贤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

向大树致敬

(代自序)

这是2008年暮秋的下个，我的家乡成都平原灰蒙蒙的一片，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都很安静。放眼望去，窗户外面那些高楼都隐隐约约，感觉有些不真实，犹如海市蜃楼一般。

我遵嘱为即将出版的《邓贤文集》（八卷本）写一篇文字，也算留下一点心情吧。

将近半年前，我也坐在这个座位上，也是一个灰蒙蒙的下午，没有风，也没有太阳，四周很静，窗外面的城市和更远处的乡村像一幅若隐若现的水墨画。但是一只黑色的厄运之手猝然撕碎了画卷，一场千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发生了！

顷刻之间山崩地裂江河改道，数百万幢房屋轰然倒塌，数以万计的生命灰飞烟灭，数十万人肢体伤残血流成河，一千多万人被迫离家……

这一天我的父亲，一个参加过抗战的八十二岁的中国驻印军老兵，他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家屋子去躲避地震，尽管余震不断楼房还在颤抖。入夜，城市里到处警笛拉响，救护车彻夜穿梭，从电视新闻中得知，全川乃至全国人民已经紧急动员起来抗震救灾。父亲关注灾情，当他看到部队官兵跑步进入灾区的画面时竟然老泪纵横。他对我说，民国三十年（1941年）重庆大轰炸，光是几座隧道内就死了上万人，重庆一片火海，你爷爷断了一条腿……

我忽然感悟到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力量绵延不断地渗透到心中。

古人云：多难兴邦。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苦难既是不幸，

又是财富。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和战乱毁灭，仅以抗战八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十四年）为例，中国死了三千万人，半壁河山沦陷，几乎所有后方城市都被炸成废墟，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屈服，支撑一个古老民族永远挺直坚强脊梁的就是信念。敌人可以烧毁我们的房屋，炸毁我们的城市，甚至屠杀我们的亲人和同胞，但是一个民族的信念不可以被摧毁，战斗意志不可以被泯灭，这就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之根！我的父亲正是因为经历了重庆大轰炸和较场口隧道惨案，两年后他满怀对敌人的仇恨，与许多跟他一样年纪的中学生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抗日前线，从此开始了一代知识分子漫长而曲折的人生跋涉。

父亲与儿子，苦难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死亡与新生，历史以一种往复循环的方式进行着关于生命创造和人文精神传承的永恒话题。父亲的大半生都是在战争、跑警报、动乱和天灾人祸中度过的，直到晚年才迎来改革开放。他是不幸的，同时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把人生的接力棒传给了儿子。作为父亲的儿子，我用笔记录下了有关父亲的传奇人生和中国远征军浴火重生的故事，于是有了《大国之魂》，我还写下了关于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日落东方》，关于豫东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黄河殇》，关于中国军队征战印缅战场的《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关于国民党残军及其华人部落在金三角漂泊的《流浪金三角》，关于一代人大起大落知青生活的《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中国知青终结》，关于警示社会人生的《饥饿杀人狂》等等，这些作品如今大都将结集在《邓贤文集》（八卷本）中出版。感谢父亲，父亲传承给儿子的不仅有生命，

还有面对苦难的姿态，以及从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力量与精神，这是儿子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我的体内流淌着父亲的血液，虽然我没有像父亲那样生于战乱，但是我从父亲甚至更遥远的先辈那里继承了一种共同的生命姿态，那就是直面苦难，永不言败。

我相信这就是文学，就是写作，更是一种连接未来的生命纽带！

几年前，我在这次特大地震震波穿越过的龙门山乡下置了两间小房，不是刻意逃避城市喧嚣，而是为了获得片刻宁静。在深山的一座古老道观，悬崖之上生长着一棵数人才能合拢来的银杏树，它树干挺拔根部裸露，经历大地震之后依然生机勃勃傲然屹立。老道长告诉我，大树生于唐代，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

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这个沉默的生命穿越岁月的烽烟迷雾来到我们跟前，它应该经历了怎样艰难和顽强的长途跋涉，如果它是个老人，一定会告诉我们一千六百年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数也数不清的故事：战争、动乱、洪水、饥饿、干旱、地震以及过眼烟云般的浮华世界达官贵人。当人类以薪火相传的接力方式走进公元二十一世纪，大树已经沐浴着新世纪的曙光迎接我们，它从来不曾倒下过，始终以这种昂扬向上的姿态巍然挺立于悬崖之上，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绿色火炬，令人感叹它不仅是一棵千年古树，更是一曲生命的礼赞。

我相信大树的心灵一定与父亲、祖父以及我们的祖先相通，我相信所有勤劳善良的人们都是大树，他们生长在城市或者乡村，而那些为了我们这

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走向文明强大而终生奋斗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们则是屹立于我们时代巅峰之上的大树。我觉得自己已经触摸到一根贯穿于宇宙空间和天地万物的生命链条，那就是，唯其毁灭，世界得以新生；唯其新生，世界得以生生不息。大树以自己的方式接受阳光回馈泥土，面对永恒，没有不朽，唯有坚强。

我肃立，向大树致敬！

当新一轮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将告别已经被历史所铭记的2008年，这一年我家乡的人民不仅收获了太多的眼泪、悲伤和苦难，同样更收获坚强、信心和力量！对我个人来说，《邓贤文集》（八卷本）的出版既是一个小站，也是一块路牌，路牌上方镌刻：继续向前，直到终点。

谨以为文，代自序。

邓 贤
2008年深秋 于成都

目 录

引 子 历史的回声	001
第一章 母与子	004
第二章 大治之年	013
第三章 山雨欲来	020
第四章 人血不是水	027
第五章 天降大任	035
第六章 走向混沌	046
第七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创业篇)	056
第八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荆棘篇)	082
第九章 广阔天地启示录(命运篇)	112
第十章 破釜沉舟	130
第十一章 暗度陈仓	150
第十二章 大卧轨	163
第十三章 北斗之路	179
第十四章 谆谆教导	191
第十五章 是火山总要爆发	194
第十六章 “三个不满意”	217
第十七章 瓦釜之声	239
第十八章 大返城	245
第十九章 走不出的红土地	266
尾 声 断碣残碑	273
后 记 我要写本书	278

历史的回声

公元一九九一年初春，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为了纪念赴滇支边二十周年，决定在成都举办一次大型图片回顾展。提议办展览并热心投入的，大多是当年兵团的知青干部，他们有热情，思想活跃，富有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并对过去那段并不辉煌的历史始终取一种基调昂扬的乐观态度。筹备组成立伊始，第一个议程便是给展览取个总标题。标题如同婴儿的名字，寄托人们对于回顾展乃至历史的全部期待。

议论结果，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
——“青春无悔”。

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

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

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

一九七一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

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农场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筹展期间，我们好不容易找来女知青的照片，准备放大展出，以志纪念。不料很快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没有人熟悉她们和能够弄清这些姑娘的姓名简历。我为此又费了一番周折，终于找到几位死者生前连队的男知青，请他们提供女知青情况。

然而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场面。知青们搔着头皮，相当尴尬地回忆了许久，终于为我凑出了七个半女知青的姓名。

其中那半个只有姓，据说还不大确切。

岁月悠悠，往事如云如烟。在尘封的记忆仓库里搜寻二十年前那些早已淡漠的生活往事乃至人物印象自然是件不大容易的事，何况他们已经不算年轻，正在或者将要步入人生的中年。我没有理由责备这些忙忙碌碌的同龄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许多纷繁的现实，包括沉重的家庭负担和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挑战。谁能只靠回忆而不是努力工作来打发短促的人生呢？

但是我又没有理由不为我的同龄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固然我们将跨入人类更加广阔的二十一世纪，跨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但是我们的历史毕竟连接着一九七一年乃至此前此后整整十年的苦难历程。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段相当漫长、曲折并布满荆棘和炼狱之火的人生道路。我们也许可以忘掉荣誉，忘掉金钱，忘掉将来有可能高悬于我们头顶之上的种种炫目的桂冠，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忘却苦难，以及由苦难强加给我们个人和整体身上的那种铭心刻骨的历史烙印。

我由此想到“青春无悔”。

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

她们会“无悔”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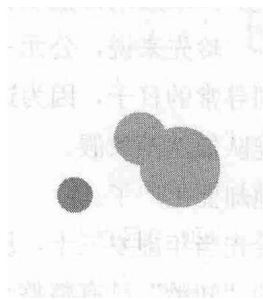
……

出门的时候，知青们脸上全都有了歉疚的表情，有人还认真地说了一些讪讪的话。我理解他们，他们不是对我而是对死者欠了一些什么。但是推而广之，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每个活着的知青是不是都对那些长眠地下的同龄人欠了一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因为曾经身为知青而自豪，而无悔，甚至很壮烈地炫耀于后人，但是当我们冷峻地直面共和国历史的尖锐诘问时，我们将怎样注释自己那一段并不短暂且众说纷纭的人生经历呢？

感谢社会各界和热心的人们为知青展览人生提供了机会和场所。

我因此也获得一个介入现实生活与周旋于历史之间的必然契机、一个全面审视与观照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心灵之路的绝好机会。



母与子

1

对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来说，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注定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学大寨”依然轰轰烈烈，连队依然不放假。

而她却要生产了。

徐玲先当年虚岁三十，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乡算起，她的“知龄”已有整整十年。从外表看，这个来自黄浦江畔的上海姑娘比她的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皮肤黝黑粗糙，手脚关节粗大，眼角过早地堆起细密的鱼尾纹。亚热带烈日和风雨无情地重塑了这个城市姑娘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使她在“接受再教育”的康庄大道上更加接近当地农妇而不是城里那些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

早晨起床，她就有了一种不平静的预感，这种预感与其说来自某种生理先兆，不如说来自女人天生的直觉。虽然女知青对于生孩子并没有亲身体验，并且此时距离预产期尚有半个多月，但是她还是切切实实感到了

那个重大时刻的猝然迫近。

草草吃过早餐，早餐还是那种一成不变的盐水汤泡饭，然后女知青心烦意乱地朝门外张望了一会儿。晨曦初露，朝霞映红天际，黛色的群山好像波涛一样遮断视线。女知青叹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望见什么，因为孩子的父亲还在学大寨工地上，而学大寨工地远在几十里之外，中间隔了两架大山，于是只好快快地拾起一只木耙，拖着沉重的身子朝晒场走去。

自从粉碎“四人帮”，农场兴起会战热，领导层层督战，连队知青便统统开上山去学大寨。名目繁多的会战如同走马灯一般转个不停：什么大战红五月、红六月、红七月……向“五一”献礼，向“七一”、“八一”、“十一”……献礼；什么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日、竞赛周、竞赛月；还有无数的即兴会战，挑灯夜战，等等，叫人应接不暇。徐玲先已经记不得连队什么时候放过假，而她和孩子父亲最后一次见面也已经是几个星期前的事了。

女知青被照顾在晒场翻晒粮食。入秋之后，堆积如山的稻谷、玉米需要晒干扬净然后入仓。虽然在连队，翻晒粮食永远是一种对于老弱病残的特殊照顾，但是对于一个大腹便便并且即将临盆的孕妇来说，有时哪怕弯一弯腰也未必是件轻松事。

上午十点，胎儿照例开始躁动，在母腹中左顾右盼，跃跃欲试。未来的母亲幸福地把这种愈见频繁的胎动称之为“做早操”。然而与往常不同的是，半小时后腹痛再次发生，并伴有令人不安的尿道压迫感和腹胀。

一个妇女停下手中活计，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叫卫生员来看看？女知青摇摇头。她已经意识到这是成熟的胎儿向母体发出的一种告别的语言，一种要求获得降生权利的迫切信号。

她甚至听见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哭。

女知青谢绝了妇女的帮助，她没有把临产的消息告诉其他人。生孩子是自己的事，自己的事就得靠自己来做，何况连队距离分场医院不算太远，只有十来里山路，这段距离对于任何勤劳勇敢的当地人包括知青都算不了什么。于是徐玲先回到自己屋里，将事先收拾好的简单行李扛在肩头上，然后挪动笨重的脚步，信心百倍地踏上通往医院产房的崎岖小路。

西双版纳位于祖国西南边陲最南端，三面与东南亚缅、老、越诸国接壤，面积约三万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区。在傣语中，“西双版纳”是数字十二，“版纳”指坝子，即十二个高山坝子的意思。这些坝子好像珍珠一样散落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崇山峻岭中，被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和森林植被所覆盖，千百年来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因此直至二十世纪中叶，西双版纳还是一片与世隔绝和未曾开垦的处女地。

《辞海》载：“西双版纳地区……位于滇南澜沧江两岸，气候湿热，林木茂盛，有‘绿宝石’之称。出产橡胶、樟脑、剑麻、香蕉、菠萝、咖啡、椰子等，并有野象、老虎、犀牛、长臂猿、孔雀和双角犀鸟等珍贵动物。……解放前这里基本上保留着农奴制度，生产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疟疾横行，是我国几个死亡率很高的‘高疟区’之一……”

由于种种原因，全国解放后，虽有小批转业官兵和垦荒队员陆续深入边疆发展生产，但是终未形成规模。直到公元一九六九年前后，随着一股上山下乡大潮的涌来，西双版纳垦区才有无数农场、分场和生产连队如同雨后春笋般宣告建立。年轻的垦荒者在深山老林里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盖草房，搭茅屋，辟道路，开荒山，种植橡胶和收获粮食。他们虽然并不全都安心屯垦戍边，但是他们毕竟年轻，有热情，并且受了革命前辈战斗精神的感召，因此决心要在边疆这块一穷二白的画布上画出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虽然历史注定在那个只生产空洞的精神和阶级斗争的癫狂年代，经济建设和物质文明决不会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数以十万计的拓荒者还是雄心勃勃地挥舞原始的劳动工具：锄、镐、斧、镰、锤、钢钎、锯子，在亚热带荒原和丛林中日复一日地投入改造大自然的伟大斗争，同时也开始了被称做“一代人精神炼狱”即接受再教育的苦难历程。

于是我们看到，整整十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

当历史已经走进一个时代新纪元并且沐浴在朝霞般灿烂的新世纪曙光中的时候，人们的目光才偶然寻找到那些被遗忘在荒山野岭中的伤痕累累的拓荒者。他们理想主义失败的全部悲剧意义不仅在于没能改变大自然，同时也在于没能改变作为改造对象的自身。

他们都拥有一个曾经无比辉煌、丰碑般矗立却又相当自卑的共同

名称：

——“知青”。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日。对于九亿五千万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一天注定是个普通而且平静的休假日：机器不再轰鸣，农民卸下担子，机关、学校和部队例行放假。城市大街上熙熙攘攘，商店货物匮乏，食品凭票供应，柜台外面到处可见市民购物的长队。

虽然此时距离粉碎“四人帮”那个历史性时刻已经过去整整两年，中国人民正以欣喜的心情注视着自己生活中那些刚刚开始和业已出现的种种变化，比如深入揭批“四人帮”，给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职工普调工资，关心群众生活，重新向雷锋学习，等等，但是这些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同一个民族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生存状态相比，毕竟是相当次要和微不足道的。

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好像一艘重新启动的航船，当它被一九七六年的历史大潮再度推动并驶向大海时，我们很难想象它会从此一帆风顺并且不再发生左右摇摆。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毕竟不可阻挡。中国终究要走向世界，走向人类文明的广阔海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九时，在中国古老的首都北京，著名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胜利召开。当身着中山服的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缓缓步入会议大厅，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庄严肃立时，一个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重大时刻就此诞生并载入史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三十五天，会议批判了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提出和解决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思想和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坚实基础。

仅仅三天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四五”天安门事件正式平反。这一重大消息在国内外激起的强烈反响几乎可与粉碎“四人帮”相比。

这天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那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徐

玲先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正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道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于是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宁静而空旷的天宇下，在云南边疆澜沧江流域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边缘，我们看到这个并不年轻的女知青努力挪动笨重的身体，如同一只顽强的蜗牛在灰带子似的羊肠小道上悄无声息地蠕动。没有人关心她的存在，就如同没有人关心蜗牛的存在一样。在她身后的山路上，她歪歪扭扭的足迹很快就被滚动的山风和飘落的尘埃抹得无影无踪，就像岁月每天都在抹去许多自生自灭的生命痕迹一样。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而那个邪恶的命运之神正在地狱门口朝她微笑。

3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橄榄坝农场七分场值班医生成果木正蹲在墙根下同狗一起晒太阳。

成医生是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小个子男人，年纪大约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出身贫农。成医生原先并不懂医，在部队服役时当过炊事兵，文化程度初小。只是因为后来转业到农场，而农场又被部队军管，才被军代表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然后穿上白大褂治病救人。

由于农场地处偏僻，医卫人员奇缺，作为“再教育”主力军的贫下中农便没有理由不占领这块重要阵地。农场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连队有卫生员，分场设卫生所，农场办医院。卫生所一般配备二三名赤脚医生，这些赤脚医生大多来自贫下中农并毕业于当地“红医班”，虽然他们对于科学的认识基本上接近一知半解，但是他们的存在对于强调思想革命化和反修

陆修却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赤脚”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明。

公正地说，成果木医生并不是那种善于投机钻营的野心家。他原本是一个淳朴的山里人，手板上长满硬茧，对土地的感情深沉而执著。但是命运无意中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那双本来应该握锄把或者掌握插秧机收割机的大手却阴差阳错地拿起了手术刀，尽管他私下承认自己对医学几乎永远没有兴趣和一窍不通。

因此他常常对自己很不满意。

“我宁愿去开荒地，养鸡，养鸭，种果树，干什么都行。谁愿意天天蹲在这里发霉呢？”他有时对病人发牢骚。

“你干吗放着医生不干，偏偏想去吃苦？”别人都不理解。

“我有力气，我才不怕吃苦。”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要是上头有政策，让私人养猪种自留地，我马上脱了这身褂子回家去干活儿！”

“那么让我们来换换工作，”有知青逗他，“我来穿白大褂，你去养猪好了。”

“那怎么行！”他把头摇得拨浪鼓一般，“我只是说着玩儿，谁他娘的愿意替你养猪。”

我们有理由把这种劳动致富的平凡愿望看做一个农民儿子始终铭心刻骨的理想之梦，一个当时注定不能实现的遥远而渺茫的人生“乌托邦”。

现在，农民的儿子成果木医生正蹲在墙根下全心全意剔指甲。他已经吃过午饭并且喝了几口酒，肚饱的感觉十分舒服，此时没有病人，所以值班医生感到百无聊赖精神空虚。办公室静悄悄的，分场机关的干部们都下基层连队蹲点去了，卫生所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长满疥疮的老狗蹲在他面前，睁着一双无精打采的眼睛望着他。

成医生打了一个饱嗝，感到一阵昏昏的睡意好像章鱼的触角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深秋的太阳温煦地照耀着他，在他眼前和心头泛起一片柔和的白光。他半睁着眼，努力同倦怠作斗争，但是酒精很快发生了作用。他渐渐开始感到身体变轻，然后向着半睡半醒的梦境之中滑去。

就在这时，一阵异常的响动好像许多小石子滚进他混沌的大脑深处。老狗呜咽起来。医生困难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他看见一个孕妇艰难地登上山坡，小心翼翼地绕过水坑，然后努力挺起那个沉重的大肚子，穿过晒坝向他走来。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做“医院”，正如任何只有执照没有医术的江湖术士都不能被称做“医生”一样。然而红医班毕业的成果木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实实实在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卫生所的前身是一间旧仓库，原先曾用做榨油和碾米的作坊，因此房梁、墙角和砖缝里到处积满厚厚的尘垢。由于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仓库迁往别处，大房子一分为三，于是七分场就有了卫生所，有了门诊部、药房和手术室。

这里最常见的手术，不外乎替伤者止血清瘀，包扎创口。最大的手术便是接生。

对当地人来说，接生似乎更接近一种动物本能而不是医疗技术，因为自然界的动物都具有自然分娩和繁衍后代的本领。在中国广大农村，数千年来，没有文化的接生婆尚且用枯槁的双手接下了数以亿计的农民后代，那么曾经进过红医班又切实占领卫生阵地（上层建筑）的赤脚医生难道有理由不把这种古老的本领发扬光大么？

所以最初那一阵，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产钳、剪刀、止血钳、针头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就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降临。

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倒是那个疲惫不堪的产妇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医生终于脱掉手套，蹲在屋外抽了几支闷烟。夕阳西下，大田劳动的人们陆续收工回家，伙食团飘出诱人的饭香，胎儿还是没有动静。医生感到肚子咕咕地抗议。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责任感的时候，医生偏偏开始感到厌倦。因为经验告诉他，有的产妇会一连发作好几天，他总不能日日夜夜守在卫生所不回家呀！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就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医生的家距离分场只有二三里路，步行约需一二十分钟。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客观地说，如果这天成医生不是碰见那个经常在一起喝酒的熟人，那个熟人恰恰也没有弄到一瓶在当时相当难得的“泸州大曲”，那么事情也